

波蘭立陶宛聯邦時期的貴族共和體制

鄭欽模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摘要

波蘭立陶宛聯邦是 16 至 18 世紀歐洲的一個獨特的政治實體，融合了君主制、貴族制與部分民主元素，並以貴族選舉國王的貴族共和制為特徵。聯邦的黃金時代發生在 16 至 17 世紀初，期間政治、經濟和文化皆繁榮鼎盛。然而，貴族共和體制最終卻導致聯邦在 18 世紀末被俄、普、奧三國瓜分。波立聯邦內部有著極其複雜的民族、宗教、社會、經濟等等問題，因而難以成功整合成為高度認同的國家，導致了擁有龐大政治權力的貴族，大都只圖自身權益的保障及擴權，不願意承擔相應的國家社會責任，使得選王制成了外國勢力入侵的管道，自由否決權更是癱瘓國家治理與改革的手段，加上連年對外征戰，國力不斷耗損。波蘭遂成了鄰國強權的俎上肉。

關鍵詞：波立聯邦、貴族共和體制、選王制、自由否決權、宗教寬容

壹、波立聯邦的貴族共和體制

波蘭立陶宛聯邦¹ (*Rzeczpospolita Obojga Narodów*,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是歐洲歷史上一個獨特的政治實體。波立聯邦於 1569 年通過『盧布林聯盟』(*Union of Lublin*) 正式成立，並持續至 1795 年被俄羅斯、普魯士、奧地利三次瓜分而告終，波蘭從此消失在歐洲的地圖上。波立聯邦的貴族共和體制 (*noble republic*) 是其最顯著的特色之一，它採用了一種獨特的貴族民主制² (*Złota Wolność*)，亦即由貴族選舉國王，而非傳統的世襲制。波立聯邦在當時的歐洲是一種稀有且非常特別的政治體制，提供了一種比當時絕大部分君主制國家更為民主的政治模式。

一般認為波立聯邦的獨特的政治體制，直接導致聯邦的盛衰。波立聯邦的黃金時代是在 16 世紀至 17 世紀初，這段時期內，聯邦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達到了頂峰。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聯邦的政治制度開始顯露出弱點，特別是 1569 年以後的貴族共和時期，由於選王制度造成貴族對國家事務的過度控制，以及自由否決權 (*liberum veto*)³ 的氾濫，導致了政府效率的低落和決策的僵化，使得聯邦難以應對內對外的挑戰。17 世紀中葉開始，聯邦遭遇了所謂的大洪水時代 (*Potop, Deluge*)⁴，一連串的戰爭和災難，對聯邦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此後，聯邦的力量逐漸衰退，最終在 18 世紀末被強鄰瓜分。波立聯邦的終結，標誌著一個曾經強大的歐洲國家的消亡，但其獨特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容忍的傳統，至今仍被許多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所研究和討論。本文擬探討波蘭貴族共和體制的背景，以及造成聯邦衰落

¹ 正式名稱為波蘭王國與立陶宛大公國的聯合體，波蘭立陶宛聯邦是 16 世紀中葉到 18 世紀末波蘭與立陶宛結合的一種政體，多數學者仍以波蘭稱呼這個國家，波立聯邦與當今聯邦體制的定義不盡相符，兩國的結盟更像是一國協 (*commonwealth*) 的形式。

² 或稱王政共和制 (*royal republic*) 或半共和體制 (*semi-republic system*)。

³ 這是一種任何貴族都可以對國家決策行使否決權的制度。

⁴ 大洪水時代是波蘭立陶宛聯邦 17 世紀中葉的一個歷史時期。廣義上這個時期以 1648 年的赫梅利尼茨基起義 (*Powstanie Chmielnickiego*) 為始，以 1667 年的『安德魯索沃停戰協定』(*Rozejm w Andruszowie*) 為終。狹義上的大洪水時代，指的是瑞典對波立聯邦的入侵與占領，因此只包括第二次北方戰爭中的聯邦階段 (1655-60)，因此也被稱為「瑞典大洪水時代」。

的內、外部因素，以闡明貴族共和體制與聯邦的衰亡的關聯。

關於波蘭的貴族共和體制，歷史學者畢斯庫柏斯基 (Biskupski, 2018: 13) 曾有這樣的描述：

1572 年之後，波蘭重新將自己定位為一個選舉君主制 (elective monarchy) 國家，亦即一個王權共和國 (royal republic)，隨後的國王由眾多的貴族投票選舉產生。被選上的國王會被要求籤署一份合同，即『修道院條約⁵』，提前限制他的統治特權並保護貴族的特權。

洪茂雄 (2010: 37-39) 將 1569-1795 的波蘭稱為「王政共和時代」，主要的特色在於國王由選舉產生、西姆 (Sejm 議會) 的自由否決權、及同盟 (confederation)。其中「同盟」是一套古老的波蘭制度，其目的在顯示公民的基本權利，任何一群人均可共誓組成，以保護本身的權益，例如 1573 年全體西姆議員均加入「華沙同盟」(Warsaw Confederation) 以維護宗教容忍原則。盧科夫斯基 (Jerzy Lukowski) 與扎瓦茲基 (Hubert Zawadzki) 將波立聯邦描述為「一個繁瑣的聯邦，而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a cumbersome federation than a unified state)，而且他們對法律執行運動的改革似乎模稜兩可，凸顯了內部整合的困難 (Wandycz, 2014: 236)。

歷史學家萬迪奇 (Wandycz, 2014: 236-38) 對於波立聯邦貴族共和體制的描述是：

貴族民主的實驗結束了，徹底失敗了。持續存在的是一個貴族國家的怨恨，儘管這個國家四分五裂，但他們仍然感到自己是一個連貫的整體，並且在其最後的歲月裡，經歷了文化和政治復興的新自豪

⁵ *pacta conventa* 是一項契約協議，起源於更早的對專制王權多所限制的「亨利國王條款」(Henry VIII clause)。從 1573 年到 1764 年，「波蘭民族」與新當選的國王在「自由選舉」王位時簽訂。它宣布了國王將立即頒布的政策 該文件由選舉國王的眾議院起草。公約確認了當選國王尊重英聯邦法律的承諾，並明確了在外交政策、國家財政、武裝部隊、公共工程和其他領域中要製定的政策。

感。

卡明斯基（Andrzej S. Kaminski）則認為，「共和國的瓜分不僅給國家帶來了死亡，而且還摧毀了僅次於英國發展最好的公民社會。」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洛德（Robert Lord）認為波立聯邦是「自羅馬人時代以來世界上最大、最雄心勃勃的實驗」（Wandycz, 2014: 236-38）。另一名歷史學者紮莫斯基（Zamoyski, 1994: 98-103）在《*The Polish Way*》一書中強調「聯邦的議會制度是歐洲最早的之一，僅次於冰島，並在法律中體現了個人自由。」不過，他也指出「儘管貴族民主制帶來了一些進步，但也存在許多局限性，最終導致了聯邦的衰落和滅亡。」

戴維斯（Davies, 2001: 260-68）認為，波蘭立陶宛聯邦的貴族民主制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實驗，試圖在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中實現貴族的自由和平等。這種制度雖然在理論上具有吸引力，但在實踐中存在許多缺陷，特別是貴族之間的內部分裂和外部勢力的干涉，導致聯邦的政治體系變得脆弱；他強調，儘管貴族民主制最終失敗，但它對波蘭和立陶宛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現代波蘭的政治文化。畢斯庫柏斯基（Biskupski, 2018: 13）也指出，波蘭貴族共和體制的主要設計者是扎莫伊斯基（Andrzej Zamoyski），其主要的靈感來自羅馬共和國的模式，也融合了許多波蘭長期發展出來的政治體制傳統，並保留了波蘭 16 世紀末發展起來的分權制度。

對於波蘭的半共和體制是否是導致波蘭逐漸衰弱、並為 18 世紀末被三次瓜分的主因，外界經常有不同的看法。盧科夫斯基和扎瓦茲基指出，面對充滿戰爭和國內動蕩的 17 世紀時，半共和體制「在面對侵略和叛亂時表現出了爆發能量和韌性的能力」（Wandycz, 2014: 236）。波立聯邦曾締造了波蘭歷史上最強盛的時期，歷史學者范迪奇（Wandycz, 2014: 35）就曾指出，隨著雅捷隆王朝對波蘭、立陶宛、波希米亞和匈牙利的統治，歐洲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王朝領土組合」。洪茂雄（2010: 51-53）在《波蘭史：譜寫悲壯樂章的民族》一書中認為，波蘭三次被瓜分，除了貴族共和體制，尤其是選王制度及自由否決權，確實導致了政府效能的低落，影響國家運

作，甚至諸侯貴族地方割據，波蘭地處強權之間卻無險可守，民族宗教混雜未能妥善整合等，都是重要原因。

波蘭-立陶宛的聯邦概念 (*Rzeczpospolita*)，是基於古希臘和羅馬的共和國模式。16、17 世紀的政治作家經常引用或解釋亞里斯多德的「政治」 (*Politica*) 和西塞羅 (Cicero) 的「共和」 (*De Re Publica*) 中的共和定義。波蘭立陶宛貴族認為混合君主制 (*monarchia mixta*) 是一種理想的政府形式，它將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元素結合在一個政體中 (Koyama, 2007: 143)。因此，波立聯邦是一個以貴族為主體的共和政體 (*Respublica*)，這樣的概念對貴族政治思想有重要意義，因此在波立聯邦，共和國被視為公民 (貴族) 的共同體，而非傳統意義上的國家機構。波立聯邦的貴族共和體制是一種以君主、貴族和民主三種成分混合的政體，而聯邦中的國王、參議院和下議院分別代表這三個要素，雖然對君主權力有所警惕，但仍認為君主是必要的組成部分 (Grześkowiak-Krwawicz, 2011: 37-41)。紮莫斯基 (Zamoyski, 1994: 92-93) 強調，貴族共和主義強調自由和權力的平衡，貴族們認為這種平衡是維持國家穩定和自由的關鍵。

波立聯邦也確立了貴族階層擁有主權的觀念，強調「沒有我們的同意就不能決定關於我們的事」的原則，貴族可以選擇國王，顯示國家屬於貴族階層。自由被視為共和國的基礎和最寶貴的特質，強調法治下的自由，但法律須由貴族自己制定，自由與自我決定權緊密相連，因而發展出貴族的「自由否決權」。卡明斯基 (Andrzej Sulima Kamiński) 則讚揚波蘭創建「公民國家」 (*państwo obywatelskie*) 的嘗試，城鎮在過程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他認為「公民」 (*obywatel*) 一詞比「貴族」 (*szlachcic*) 一詞更恰當，甚至提醒人們，1832 年之前，波立聯邦有投票權的人比英格蘭多 (Wandycz, 2014: 235)。波立聯邦的貴族共和體制，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政治文化傳統，對波立聯邦的政治制度產生深遠影響，在歐洲共和主義思想史上具有特殊地位，這個貴族共和主義模式展現了波立聯邦獨特的政治思想傳統，雖然限於貴族階層，但在主權理論和政治制度上有其創新之處 (Grześkowiak-Krwawicz, 2011: 41-45)。

貳、波蘭貴族共和體制的背景與演變

波蘭王國和立陶宛大公國在中世紀末期面臨地緣政治與共同的外部威脅，促使兩國尋求更緊密的合作。兩國在 14 世紀至 15 世紀之間面對來自北方條頓騎士團（Teutonic Knight）的侵略。條頓騎士團的目標是征服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並擴大其影響力。這對波蘭和立陶宛構成了重大安全挑戰。在 1410 年，波立兩國聯軍在格倫瓦德戰役（Battle of Grunewald）中打敗了條頓騎士團，顯示了雙方軍事合作的潛力。除了條頓騎士團，立陶宛大公國在東部也面臨來自莫斯科公國的壓力。隨著莫斯科勢力在 15 世紀逐漸崛起，立陶宛的東部領土頻繁遭受攻擊，這使立陶宛更需要來自波蘭的支援。而在兩國南部，鄂圖曼帝國和克里米亞韃靼人的侵擾也是波蘭和立陶宛共同面對的挑戰，這進一步促進了兩國的軍事合作。

在共同安全需求的條件下，波蘭與立陶宛的王室聯姻進一步促成兩國的結盟，尤其是 1385 年 8 月 14 日兩國簽署的『克雷沃聯盟』（*Krewo Union*）。克雷沃聯盟是波蘭和立陶宛之間第一次正式的結盟，波蘭王國的女王雅德薇佳（Święta Jadwiga）與立陶宛大公雅蓋沃（Jagiello）結婚，促成了兩國王室的聯合。根據協議，立陶宛大公雅蓋沃改皈依天主教並成為波蘭國王，是為瓦迪斯瓦夫二世（Władysław II Jagiello），聯盟的要旨在加強兩國的合作，抵禦條頓騎士團的威脅。克雷沃聯盟使波蘭和立陶宛之間的關係更加密切，兩國的軍事和政治合作日益加深。雖然波蘭和立陶宛有共同的國王，但在各自內政上仍保留相對的獨立性（Bubczyk, 2002: 23-24）。

波立聯邦是一個聯邦制國家，由波蘭王國和立陶宛大公國組成。這在當時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政治結構，它由兩個分別擁有自己的政府、貨幣、軍隊和法律系統的國家組成。這兩個政治實體在理論上是平等的夥伴，但實際上波蘭在聯邦中擁有較大的影響力。聯邦實行相對寬容的宗教政策，允許多種宗教在其領土上自由實踐，這在當時的歐洲也是相當罕見的。這種宗教自由吸引了許多不同信仰的人，包括大量的猶太人，使得聯邦成為當時歐洲最大的猶太人居住地之一。到了 1572 年，促成波立聯邦成立的國王西吉蒙德·奧古斯特（Zygmunt II August）逝世，雅捷隆王朝絕嗣，由於統治

整個聯邦的正朔—雅蓋沃家族不復存在，因此沒有人擁有王位的合法繼承資格，於是貴族們便決定以選舉形式推舉出國王，這是波立聯邦選王制的開始，其形成的政治制度即是「貴族共和體制」(Davis, 1997: 260-61)。

波蘭貴族地位的迅速提升起源甚早，卡什米日大帝(Kazimierz the Great)死後無嗣，由他的外甥，來自匈牙利安茹王朝的路易斯(Louis of Anjou)，波蘭人稱其為路德維克(Ludwik Węgierski)；路易斯於1370年11月17日在克拉科夫(Kraków)加冕為波蘭國王，之後就鮮少踏跡波蘭領土，政務全交給他的波蘭母親伊莉莎白(Władysława Elezabeth)，而伊莉莎白就在波蘭貴族的襄助下治理國家，於是貴族在波蘭的國家治理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Banaszak, et al., 1998: 30)。波蘭和立陶宛的貴族階層在聯邦形成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兩國的貴族都有自身的政治利益和訴求，而這些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聯邦的建立。波蘭的貴族希望透過與立陶宛的結盟來確保更多的商業機會和安全保障。而立陶宛的大貴族則希望通過聯盟來鞏固自身的地位，並抵禦來自東方莫斯科的威脅。波立聯邦建立後，兩國的貴族推舉共同的國王，但各自保留自己的法律制度、軍隊和貨幣，確保貴族階層的利益不會因聯邦的成立而被削弱(Wikipedia, 2024: Szlachta)。

共同的經濟利益也是促成波蘭與立陶宛聯合的關鍵因素。兩國在經濟上互補，形成了自然的合作需求。波蘭是歐洲重要的糧食生產國，尤其是在16世紀，穀物貿易成為波蘭的重要經濟支柱。波蘭貴族希望能夠藉由結盟控制立陶宛公國的貿易路線，尤其是波羅的海和黑海的貿易通道，來提升經濟利益。立陶宛擁有廣闊的森林和豐富的自然資源，並且其東部領土是通往莫斯科和東方貿易的要道。結盟有助於兩國更有效地控制這些資源並共同開拓市場。波立兩國乃於1569年簽署了『盧布林聯盟』，從此波蘭和立陶宛正式建立了波立聯邦，雙方從克雷沃聯盟時期的「王室聯合」提升為更緊密的「聯邦體制」。根據『盧布林聯盟』，波蘭和立陶宛仍然保留各自的軍隊、法律制度和行政機構，但兩國共推一位國王，並且擁有共同的外交政策和國會(Wikipedia, 2024: Union of Lublin)。這種體制既保留了兩國的獨立性，又實現了政治上的結合。而在此一背景下，立陶宛不得不割讓部分土

地給波蘭⁶，雖然引發了一些立陶宛貴族的不滿，卻也為聯邦的統一提供了更加穩定的地理基礎。

參、內部整合失利，難以構建國族認同

波立聯邦成立之後，國境之內各種民族匯聚，成了包含波蘭人、魯塞尼亞人（今天的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立陶宛人、日耳曼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韃靼人等人的大社區，其中波蘭人可能只占微弱的多數。而聯邦內部存在多種語言和宗教，包括波蘭語、立陶宛語、拉丁語、德語、希伯來語等，以及天主教、東正教、新教和猶太教等宗教。這種多元文化和宗教自由在當時的歐洲是相對罕見的。波立聯邦成為一個從多樣性逐漸整合而統一的巨大實驗，透過這種實驗，讓各種異質元素與波立聯邦的民族文化進行融合。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民族文化僅限於精英階層，它滲透到社會意識的程度，恐怕還不到總數的十分之一，因而難以建構一種涵蓋大部分人口的民族文化共同體（Biskupski, 2018: 14）。

波立聯邦貴族共和這種體制創新，因涉及的宗教寬容問題而變得更加複雜。1572 年皇家共和國成立時，新教改革已在聯邦吸引了許多信徒，特別是貴族階層。1573 年在華沙簽署的聯盟協議，被認為是「在歐洲歷史上首次將宗教寬容原則寫入國家法律」。因此，貴族的宗教異質性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他們努力在法律上建立一個權力下放和宗教寬容的國家。與西歐國家不同，波立聯邦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教派多元化的國家，擁有大量的東正教人口以及不斷增長的猶太人口。而新教在功能上對波立聯邦的挑戰則不如對西歐國家的挑戰。震撼歐洲數十年的宗教戰爭從未在波立聯邦出現。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當時的波立聯邦的愛國主義與現代的族群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有著根本的差異。只要國家安全允許維持寬宏的國內秩序，聯邦的宗教寬容就會持續下去（Biskupski, 2018: 15）。儘管在當今的眼光看來，這種社會上僅有少數人容忍不同基督信仰的做法，還談

⁶ 例如沃里尼亞（Volhynia）、波多里亞（Podole）、及烏克蘭的一些地區。

不上真正的寬容，但放眼當時的歐洲，華沙聯盟協議所提倡的宗教寬容已經是無與倫比了（史奈德，2023：75）。此乃波立聯邦前期興盛的主要原因。然而從瓦薩家族入主波蘭之後，其堅定的天主教會擁護者立場，使天主教會逐漸佔據主導地位，加上連年戰事失利，使波立聯邦社會逐漸失序，因而宗教上的分歧經常引發衝突，特別是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矛盾尤為突出。

波立聯邦的經濟以農業為主，特別是大莊園制（*folwark*）在 16 世紀後期成為主導的經濟模式，主要依賴出口穀物至西歐國家，這種過度依賴單一市場的情況，在歐洲 30 年戰爭（1618-48）期間，歐洲市場高度動盪，因而造成聯邦穀物出口受阻，經濟受到重創。由於上述農業經濟居主導地位，導致工業發展緩慢，加上缺乏資金和技術支援，工業化在波蘭始終未能蓬勃發展。此外由於貴族不需納稅，稅收制度紊亂低效，造成農民和城鎮居民的稅收負擔沉重，國庫收入嚴重不足。許多貴族甚至透過私人擁有的港口來壟斷貿易，削弱了城市作為經濟中心的地位，導致城鎮經濟萎縮。再加上 16-17 世紀，聯邦經歷了多場戰爭，軍事支出壓力不斷加重，加劇了聯邦的財政負擔。聯邦內部的經濟壓力和社會不平等也加劇了民族衝突，農奴制度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和現代化，農民和城市居民經常受到貴族的剝削，這種社會不平等引發了多次農民起義和城市暴動。

社會經濟與宗教的不平等導致 1654-67 年的哥薩克起義，也稱為赫梅利尼茨基起義，是波立聯邦與烏克蘭哥薩克人之間的一場重要衝突，也是波立聯邦歷史上最嚴重的危機之一。哥薩克是波立聯邦南部邊疆（今烏克蘭地區）的自由戰士和農民，原本負責防禦邊疆並對抗鄂圖曼帝國和克里米亞汗國（Crimean Khanate）的襲擊。衝突的起因是波立聯邦政府試圖削弱哥薩克的自主權，將其軍事地位限縮，並推動將自由哥薩克重新編入農奴制度；天主教化政策引發當地東正教哥薩克和農民的不滿，特別是波蘭貴族對東正教的歧視態度加劇了緊張局勢。赫梅爾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與克里米亞汗國結盟，對波蘭南部的貴族領地和軍隊造成重創（Banaszak, et al., 1998: 48-49）。

哥薩克起義期間，波立聯邦內部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動盪和貴族的權力

鬥爭，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統治能力。衝突導致了大規模的破壞和經濟損失，農業生產和貿易也受到嚴重影響。戰爭和隨之而來的飢荒和疾病導致大量人口死亡，又進一步削弱了經濟。哥薩克起義也加劇了天主教和東正教之間的宗教衝突，導致社會更加分裂。事件之後哥薩克人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權，這改變了波立聯邦內部的權力結構。俄羅斯在這場衝突中獲得了大量領土，並逐漸崛起為東歐的主要強國，對波立聯邦構成了更大的威脅。反觀波立聯邦則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持續下降，逐漸失去了對東歐地區的控制。這些影響共同作用，使得波立聯邦在之後的幾十年內逐漸走向衰落。

肆、對外征戰連連，國力進一步削弱

在 17 世紀初，波立聯對瑞典和俄羅斯的軍事勝利，使該國在東方佔據了霸主地位，國際地位從未如此強大，但在歐洲的地緣政治處於一個相當矛盾的地位：1610 年，聯邦軍隊在庫申戰役（Battle of Kluszyn）中擊敗俄國人，甚至佔領了克里姆林宮，儘管俄羅斯人和瑞典人屢次被擊敗，但兩國都沒有被擊垮，兩國的軍事實力反而在不斷上升中，聯邦的安全環境並非一勞永逸；此外，迅速擴張的奧圖曼土耳其帝國（Ottoman Empire），也將黑海沿岸地區視為未來擴張的地區（Biskupski, 2018: 15）。當時國王巴托利甚至曾有個「大計畫」（Grand Design）構想，擬以波立聯邦為核心，將信奉東正教的俄國征服，再將土耳其逐出巴爾幹，使整個東南歐均納入天主教世界，建立一個包含波蘭、立陶宛、匈牙利、和俄羅斯的邦聯（洪茂雄，2010：40）。

波立聯邦與莫斯科公國的衝突主要圍繞東歐地區的領土控制和影響力擴張，包括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波羅的海地區。俄國沙皇伊凡四世為了控制波羅的海出海口，開啟俄國的貿易通道，乃於 1558 年發動立沃尼亞戰爭（Livonian War），聯邦雖在巴托利（Stefan Batory）國王的領導下擊退俄軍，仍讓俄羅斯保有部分出海口。來自瑞典瓦薩（Wasa）王朝的西吉蒙德三世（Zygmunt III）被推選為聯邦國王之後，試圖利用俄羅斯「動亂時期」（Time

of Troubles) 的內部混亂發起的一系列軍事和政治干預，試圖將天主教擴展到東正教居主導地位的俄羅斯地區，並擴大在東歐的影響力及奪取莫斯科的控制權。1610 年波立聯邦軍隊大敗俄羅斯和瑞典聯軍，隨後波軍隊進入莫斯科，西吉蒙德三世試圖讓兒子弗瓦迪斯瓦夫 (Władysław) 加冕為俄國沙皇；然而，波立聯邦的佔領卻也引發俄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俄國民兵在 1612 年於庫茲馬·米寧 (Kuzma Minin) 和德米特里·波扎爾斯基 (Dmitry Pozharsky) 的領導下反攻，聯邦軍隊被逐出莫斯科。

波立聯邦與瑞典的戰爭，主要是圍繞波羅的海地區的控制權和王位繼承問題。尤其是 1599 年因為親天主教政策與專制傾向引發瑞典貴族的不滿，而被瑞典議會廢黜的西吉蒙德三世 (Zygmunt III)，一心想奪回瑞典王位，並建立環波羅的海霸權，導致兩國長期對抗 (Banaszak, et al., 1998: 46)。瑞典國王卡爾 9 世 (Karl IX) 於 1600 年，率軍進攻波立聯邦控制的立沃尼亞 (今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南部)，瑞典軍隊迅速佔領多地，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1605 年，波軍霍德凱維奇 (Jan Karol Chodkiewicz) 在基爾霍爾姆戰役 (Battle of Kirchholm) 擊敗瑞典軍隊，削弱了瑞典在立沃尼亞的軍事優勢。然而，聯邦因內部政治問題 (如貴族之間的分歧及自由否決權的濫用) 和對俄國的軍事干預 (1605-18 年俄波戰爭)，無法全力對付瑞典。戰爭導致了聯邦失去了對立沃尼亞北部和里加 (Riga) 的控制，削弱了其在波羅的海地區的影響力，也對波立聯邦的經濟造成了沉重負擔，尤其是波羅的海貿易的損失進一步削弱了國家的財政基礎。尤其波蘭無法有效動員貴族支援持久戰爭，暴露出聯邦內部貴族共和體制的弱點。

17 世紀初的連年戰爭，使聯邦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大幅削弱，尤其是 1648 年爆發的赫梅爾尼茨基哥薩克起義和隨後的波俄戰爭 (1654-67)，聯邦的東部領土飽受摧殘，國家防禦能力嚴重不足。波立聯邦軍隊自 1648 年起在多次戰役中屢屢失利，導致中央政府面臨分裂與無力應對的困境，而瑞典的介入，更使得聯邦陷入多線作戰的困境，無法全力對抗俄國和哥薩克聯軍。波蘭於 1667 年與俄國簽訂『安德魯索沃條約』 (Andrusovo Treaty)，才結束了歷時 13 年戰爭。哥薩克起義與波俄戰爭使聯邦失去了重要的東部領土，標誌著聯邦在東歐影響力的下降；這場起義和俄國的入侵導致聯邦人口銳

減、經濟崩潰，內部矛盾激化，國力持續衰退。

奧圖曼帝國自 16 世紀開始向東歐擴張，通過控制附屬的克里米亞汗國，加強了對黑海北岸的壓力，其中也包括波立聯邦領土。奧圖曼帝國希望進一步擴充其勢力範圍，削弱波立聯邦對南部邊疆的控制。在這樣的情況下，克里米亞汗國頻繁入侵聯邦的南部邊界，並進行大規模掠奪，甚至將聯邦的農村人口作為奴隸販售到奧圖曼帝國。這些襲擊造成聯邦邊疆地區的經濟和人口重大損失。1672 年，奧圖曼帝國攻佔波多里亞（Podole）地區，並迫使波立聯邦簽訂屈辱的『布查奇條約』（*Treaty of Buchach*），聯邦割讓大片領土並支付巨額貢金。隨後波立聯邦在索別斯基（Jan Sobieski）的領導下，於 1673 年的霍廷戰役（Battle of Khotyn）中大勝奧圖曼，最終波立聯邦仍被迫承認奧圖曼對波多里亞的控制（Banaszak, et al., 1998: 50）。

霍廷戰役之後，奧圖曼帝國更進一步向中歐擴張，1683 年兵臨維也納城下，威脅神聖羅馬帝國。當時已獲選為聯邦國王的索別斯基應哈布斯堡皇帝的請求，率領聯邦軍隊馳援維也納。波立聯邦、神聖羅馬帝國和威尼斯聯軍，在維也納之役中重創奧圖曼軍隊，成功解除了奧圖曼帝國對維也納的包圍（Banaszak, et al., 1998: 51）。儘管如此，頻繁的南部戰爭進一步削弱了聯邦的財政和軍事實力，尤其在 17 世紀末，波蘭已經無法與奧圖曼帝國和克里米亞汗國抗衡。戰爭也加劇了聯邦內部的宗教和民族矛盾，特別是在烏克蘭地區，聯邦對哥薩克的控制更加困難。波立聯邦在 17 世紀與奧斯曼帝國和克里米亞汗國的戰爭中，雖然多次成功抵禦南方的威脅，但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導致聯邦內部進一步的分裂。

伍、貴族共和體制對波立聯邦政治發展的影響

波立聯邦貴族共和體制的核心是貴族對國家的廣泛控制。這種制度的優點在於它提供了一種民主形式，所有貴族都有權參與國王的選舉，並在各級議會中決定國家政策，這在當時的歐洲是相當進步而罕見的。貴族選舉國王的權力確保了國王的權力受到制衡，並且通過自由否決權，一個貴族就能否決整個議會的決定，這在理論上確保所有貴族的意見都被考慮到。

然而，沒有任何政治制度可以單獨而完美的存在，波立聯邦的貴族民主制在當時的極為不利的內外環境中，展現出其致命的缺點。

在波立聯邦的貴族共和體制中，雖然貴族的影響力為聯邦的穩定提供了一定的基礎，尤其是在內部衝突的時候，貴族階層的合作有助於維持國家的統一及政策的推動。然而貴族的專權也使得平民百姓，尤其是農民，長期處於社會底層，更難以參與公共事務。貴族與農民之間的矛盾、土地剝削問題以及貴族的貪婪行為加劇了社會分裂。波立聯邦時期的政治社會整合是一個充滿矛盾和挑戰的過程。儘管波蘭和立陶宛兩國在形式上實現了政治聯合，並且在貴族階層中保持了一定的共識，但由於貴族間的權力鬥爭、宗教衝突、經濟不平衡以及外部威脅的影響，聯邦的整合始終未能完全實現（Zamoyski, 1994: 102-103）。

貴族權力過度膨脹對聯邦的內政和外交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在內政上導致了權力的高度分散，貴族對地方事務擁有極大的自主權，促進了地方自治和貴族階層的利益，但也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權威和效率。而在外交上，貴族選舉國王的制度使得外國勢力能夠通過支持某個候選人來影響波蘭政治，雖然有助於促進聯邦與外國的合作及結盟，但也使聯邦容易受到外國干涉和分裂。波立聯邦貴族內部就曾因不滿執政的國王揚二世·卡齊米日（Jan II Kazimierz）的政策，部分貴族甚至在瑞典入侵期間轉向支援瑞典，導致國內防禦力量進一步削弱（Banaszak, et al., 1998: 46-47）。由於貴族對國王的控制，波立聯邦的國王往往缺乏執行外交政策的自主性，處處受制於頂層貴族，因而限制了聯邦在國際舞台上的行動能力。

波立聯邦貴族共和體制中的貴族自由否決權允許任何一位出席議會的貴族對議會決議進行否決的權力。自由否決權的存在使得任何政治改革都難以實施，因為只需要一個反對者就能使整個議會的努力付諸東流。這種制度在短期內可能有助於保護貴族階級的利益，但從長遠來看，它削弱了國家的統一和發展，最終連貴族的特權都無法保障。被認為波立聯邦第一個使用自由否決權的貴族西琴斯基（Władysław Siciński），就曾在 1669 年的議會中使用了自由否決權來阻止重要的軍事改革法案，該次事件不僅阻止了該法案的通過，還導致了議會的解散，從而暴露該制度的弱點

（Wikipedia, 2024: Władysław Siciński）。這種權力的濫用導致了政府的無效率，使得聯邦在面對外部威脅時無法形成統一的應對策略，最終對波立聯邦的國際地位和主權造成了負面影響。

波立聯邦的國王選舉制也是當時一種特殊的政治設計，國王選舉制允許貴族階級通過自由選舉選出國王，而不是通過當時歐洲國家一般採用的世襲繼承。選王制的優點在於它提供了一種民主的元素，因為所有貴族都有權參與選舉過程，這在當時的歐洲是相當進步。選王制主要是為了防止了權力的過度集中，因為選舉出來的國王的權力受到了限制，因此需要貴族的支持才能執行政策。由於每位貴族都有否決權，這使得政府的決策過程變得非常緩慢和低效，除此之外，這種制度也容易導致外國勢力的干預，因為外國王室成員經常被選為波蘭國王，因而使聯邦經常捲入國際政治的爭端中。西吉蒙德三世與瑞典的王位爭奪戰，就是個明顯的例子。波蘭的國王選舉制也可能導致內部分裂，因為不同的貴族派系可能支持不同的候選人（Bubczyk, 2002: 30）。1668 年瓦薩王朝結束後，一直到 1772 年波立聯邦首次被瓜分為止，100 多年間王位更動了 7 次，在這些國王當中，除了索別斯基之外，其餘皆是強權國家的附庸（洪茂雄，2010：46）。

波立聯邦國王的選舉過程通常在全國貴族大會上進行，這是一個由所有貴族參加的開放場合。在選舉中，貴族們會集合在一個指定的地點，通常是在華沙的皇家城堡（Royal Castle）或其他重要城市的公共場域（Banaszak, et al., 1998: 44）。選舉國王期間，貴族們會討論和評估各個候選人，然後進行投票。國王候選人不必是波蘭人，這使得許多外國王室成員也有機會被選為波蘭國王，這樣做既可以與候選人的原籍國建立聯盟，也可以保持國內貴族間的權力平衡。一旦選出新國王，他必須遵守一系列限制王權的所謂『修道院條約』，這些條約規定了國王的權力範圍，並保證了貴族的特權和自由。國王的權力相對有限，他在統治期間必須與貴族合作，並受到他們的監督。

波立聯邦選王制的影響極其深遠。它促進了政治參與和代議制的概念，這些概念後來在其他歐洲國家和美國的政治制度中得到了發展。然而，它也顯示了民主制度在缺乏有效的決策機制和權力平衡時可能面臨的問題。

最終，這種制度未能防止波立聯邦的衰落和最終的被瓜分。在許多方面，波立聯邦的選王制可以被視為是一個實驗，它試圖在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間找到一種平衡，雖然最終未能持續，但它對後來的政治思想和制度設計產生了影響。波立聯邦選王制是研究歐洲政治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也深具警世效果，即使是最具創新性的政治制度也需要整個大環境的配合，並且需要經過不斷的評估和改進，以應對不斷變化的政治和社會需求。

陸、波立聯邦貴族共和體制的政治危機

波立聯邦的貴族雖然擁有高度的自治權，但他們之間的利益和權力爭奪導致頻繁的內部分裂。由於國王選舉過程經常被金錢和外國勢力操控，貴族往往成為外國代理人，投票給受外國支援的候選人。這使得國王無法獨立施政，國家政策常常被外國勢力左右。貴族的鬥爭不僅限於政治議會，還常常演變成軍事衝突。內戰進一步削弱了國家的整體力量，加上國王經常是強權的傀儡，使波立聯邦難以對抗外部侵略。各貴族派系不斷爭奪對國王、議會和地方權力的控制，他們經常互相發動武裝衝突，導致內戰和社會動蕩。而貴族在地方擁有廣泛的自主權，也使中央政府無力統一調動資源。在這樣的情況下，波立聯邦實際上成為一個權力分散、缺乏有效中央控制的鬆散邦聯，進一步加劇了聯邦內部政治的不穩定性。

18世紀波立聯邦的貴族共和體制使得貴族壟斷國家的經濟體系，因此對國家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貴族大量擁有土地，卻拒絕進行任何形式的土地改革或徵收更多的稅收。他們擁有的廣大莊園是經濟的核心，但缺乏有效的現代化管理。這導致經濟增長停滯，財政危機加劇。由於貴族掌握大部分財富和土地，他們對土地的管理往往追求短期利益，忽視了長期的土地改良和農業生產力的提升，導致波蘭社會出現嚴重的貧富差距，農民無法獲得土地或政治權利，更導致社會動盪。同時，農奴制的存在使得農民缺乏改善生產條件和提高生產效率的動力，這進一步加劇了農業生產的低效率。基於貴族的自由否決權，政府很難實施迫切的經濟改革，因而導致了經濟發展的停滯（Orvis, 1916: 168-71）。

在工業和商業方面，貴族共和體制也未能有效支持這些領域的發展。貴族的特權阻礙了商業法規和貿易政策的制定，貴族對貿易的控制和保護主義政策限制了市場的開放和競爭，更阻礙了商業創新和經濟多元化。由於政治權力的分散和缺乏中央集權的政策支持，波蘭未能建立起強大的國家支持的工業基礎。在國際貿易方面，波蘭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東西貿易的樞紐，但政治體制的弱點限制了其在國際貿易中的角色。波蘭貴族對外貿的控制和對內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使得國際商人對於與波蘭進行長期貿易投資持謹慎態度。這不僅影響了波蘭的出口潛力，也限制了其從國際貿易中獲得更多利益的能力。

貴族民主制度還影響了法律制度的發展。由於貴族階級控制了立法機關，法律往往反映了貴族的利益，而非廣大人民的需求。這種情況在司法實踐中也有所體現，貴族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和利益來解釋和應用法律，這對法律的公正性和一致性造成嚴重的影響。由於貴族更關注於保護自己的特權而非國家的整體利益，聯邦的軍事力量也因為貴族的私人軍隊而分散，缺乏中央集權的指揮系統。這種分裂的政治環境使得聯邦無法有效抵抗外來的侵略，如 17 世紀中期的洪禍和俄羅斯的侵略(Lukowski, 1985: 561-62)。波蘭的宗教寬容也受到了挑戰，因為天主教會試圖鞏固其在波蘭的影響力，這導致了對新教徒和東正教徒的迫害(洪茂雄，2010：44-45)。這種宗教上的壓迫加劇了社會的不滿和分裂，特別是在東部邊境地區，這些地區的居民多為東正教徒，他們對聯邦政府的波蘭化政策感到不滿(Wikipedia, 2004: Royal elections in Poland)。

波蘭的貴族民主制度還導致了對外關係的不穩定性。由於貴族們各自為政，他們往往根據個人利益而非國家利益來決定外交政策，這種分散的權力結構使得聯邦無法有效地與其他國家進行長期穩定的外交合作。波立聯邦的外交政策多變且不連貫，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波蘭與其他歐洲大國的關係，並限制了其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Banaszak, et al., 1998: 58-59)。17 世紀末至 18 世紀，聯邦的內部矛盾加劇，外部列強的壓力也在增加。波蘭遭到強鄰干涉內政的原因很多，涉及歷史、地緣政治、經濟利益和國際法律等複雜因素。從歷史角度來看，波蘭地處歐洲中心，與多個大國接

壤，其政治穩定性對周邊國家有重要影響。此外聯邦的經濟資源和戰略位置也吸引了其他國家的關注，這些國家試圖通過干涉波蘭內政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地緣政治上，波蘭與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等國家的關係複雜，這些國家為了自身的安全和擴張需要，經常試圖控制或分割波蘭(Orvis, 1916: 187-89)。

18 世紀中葉以後，凱薩琳女皇 (Tsarina Katherine) 治下的俄羅斯在與奧圖曼帝國的戰爭中逐漸擴大勢力，使得奧地利和普魯士等歐洲其他國家對俄羅斯的擴張感到擔憂，波立聯邦遂成為他們調整權力平衡的地區。奧地利和普魯士這兩個日耳曼強權也在東歐爭奪影響力。波立聯邦脆弱的局勢為他們提供了介入的機會。18 世紀的啟蒙思想鼓勵政治改革和中央集權，貴族共和體制的波立聯邦猶如一盤散沙，在歐洲強國的中央集權趨勢中顯得愈發落伍，鄰國甚至認為瓜分波蘭是一種「文明的解決方式」(Bubczyk, 2002: 40-41)。波立聯邦在索別斯基之後的國王選任，基本上已經完全受制於俄、法、普、奧等諸強權的意志，當時大多數的貴族仍然傲慢自大且保守貪腐，堅決抗拒改革。1717 年聯邦的西姆議會在俄軍的包圍下，宣示通過議案，對本國的財政軍事自我設限，全盤接受俄國的宰制。在這種情況之下，等在波蘭前方的，就只剩下被瓜分的命運了。

柒、結論

波蘭立陶宛聯邦的半共和體制是一個在當時的歐洲極為罕見的政體，將共和與君主制相結合，貴族擁有相當大的權力和影響力。形成這種獨特政治體制的背景，主要是因為波蘭與立陶宛的貴族，為了當時兩國的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所進行的一種政治聯盟。波蘭貴族的擴權由來已久，遠早於波立聯邦的成立，且波蘭在西元 966 年就已經進入西方文明體系，因此兩國結盟後，主要是波蘭的政治體制、經濟模式、社會生活、與宗教文化等大量進入立陶宛，由於當時立陶宛仍是異教徒國家，境內也有眾多的東正教徒，導致兩國在各種面相上的整合上都非常困難，於是波立聯邦的貴族共和體制，在越來越分裂的政治社會中，貴族越來越以私立為重，置國家的

利益於度外，波蘭也因此逐步走向貴族之間的殘酷鬥爭，並有越來越多的貴族與外國勢力勾結。18 世紀分崩離析的波蘭，正好成了歐洲逐漸崛起的強權俄羅斯、普魯士及奧地利等三國眼中的肥肉。

至於 18 世紀波立聯邦被三次瓜分，其背後的原因相當錯綜複雜，貴族共和體制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若謂貴族共和體制直接導致了波蘭三次被瓜分仍非公允。波立聯邦的民族構成相當多元，宗教派別林立，社會結構複雜，凡此種種都導致波蘭內部整合的困難，使其無法發展出一個高度認同的社會。再加上對外征戰連連，國力不斷耗損。波立聯邦成立的背景主要是為了應付強鄰環伺的環境，聯盟成立之後，這樣的國際環境並未改變，甚至長期陷入與瑞典、俄羅斯、及奧圖曼帝國的軍事衝突。貴族共和時期因貴族爭權奪利導致的內耗，影響了波蘭的發展與改革，對照俄羅斯、普魯士、奧地利國力的不斷提升，聯邦極為重要的地緣戰地位，反而成了列強滲透及侵略的主要原因。

波立聯邦的貴族共和體制以貴族對國家的廣泛控制為核心，這種制度在當時提供了一定的民主元素，特別是在選舉國王和貴族享有自由否決權方面。然而，這一體制在實施過程中也暴露出多種缺陷，尤其是在內外不利環境的挑戰下。貴族之間的權力鬥爭、宗教衝突、經濟不平衡以及外部威脅使聯邦的政治社會整合困難，雖然形式上實現了波蘭和立陶宛的聯合，但始終未能完全實現穩定與發展。聯邦的選王制原本意在防止權力過度集中，然而，外國勢力的介入和貴族內部分裂使得這一制度無法有效運作。最終，這種制度的缺陷在聯邦面對外部威脅時未能有效凝聚國家力量，並導致聯邦的衰落。波立聯邦的貴族共和體制雖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創新性，促進了政治參與，但在內外環境艱困的情況系，這套體制缺乏有效的決策機制和權力平衡的弱點一覽無遺，雖在聯邦被完全瓜分前曾嗅到一絲改革的契機，但為時已晚。

參考文獻

- 史奈德，提摩希（盧靜、廖珮杏、劉維人譯），2023。《民族重建：東歐國家克服歷史考驗的旅程》。新北：衛城出版。
- 洪茂雄，2020。《波蘭史：譜寫悲壯樂章的民族》。台北：三民書局。
- Banaszak, Dariusz, Tomasz Biber, Maciej Leszczyński, and Richard Brzezinski. 1998.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Poland*. Poznan: Wydawnictwo Podsjedlik-Raniowski & Co.
- Biskupski, Mieczysław B. 2018. *The History of Poland*.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 Bubczyk, Robert. 2002. *A History of Poland in Outline*. Lublin: Maria Curie-Skłodowska University Press.
- Davies, Norman. 2001. *Heart of Europe: The Past in Poland's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ześkowiak-Krwawicz, Anna. 2011. "Noble Republicanism in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An Attempt at Description."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Vol. 103, pp. 31-65.
- Koyama, Satoshi. 2007.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as a Political Space: Its Unity and Complexity," in Tadayuki Hayashi, and Fukuda Hiroshi, eds. *Reg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pp. 137-53. Sapporo: Hokkaido University, Slavic Research Center.
- Lukowski, Jerzy T. 1985. "Towards Partition: Polish Magnates and Russian Intervention in Poland during the Early Reign of Stanislaw August Poniatowski."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8, No. 3. pp. 557-74.
- Orvis, Julia Swift. 1916. *A Brief History of Polan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 Wandycz, Piotr. 2014. "Reviews of Short History of Poland."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Vol. 109, pp. 233-48.
- Wikipedia. 2024. "Władysław Sicińsk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ładysław_Siciński) (2024/9/8)
- Wikipedia. 2024. "Szlacht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zlachta>) (2024/9/9)
- Wikipedia. 2024. "Union of Lubli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on_of_Lublin) (2024/9/9)
- Wikipedia. 2024. "Royal Elections in Pol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yal_elections_in_Poland) (2024/9/12)

Zamoyski, Adam. 1994. *The Polish Way: A Thousand-year History of the Poles and Their Culture*.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The Aristocratic Republican System During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Chin-mo Che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New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was a unique political entity in Europe from the 16th to the 18th century, blending elements of monarchy, aristocracy, and partial democracy, characterized by a noble republic where the king was elected by the nobility. The Commonwealth's golden age occurred from the 16th to the early 17th century, during which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spects flourished. However, the noble republic system ultimately led to the Commonwealth's partition by Russia, Prussia, and Austria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The Commonwealth faced extremely complex issues related to ethnicity, religion, society, and economy, making it difficult to integrate into a highly cohesive nation. This resulted in the nobility, who held vast political power, primarily seeking to protect and expand their own interests without assuming corresponding nation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e elective monarchy became a conduit for foreign intervention, and the *liberum veto* further paralyzed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reform. Coupled with continuous external wars, the nation's strength was constantly depleted, leading Poland to become prey to neighboring powers.

Keywords: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aristocratic republican system, elective monarchy, *liberum veto*, religious tolerance, national identity

